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A 卷 B 卷 C 卷

课程名称： 绿地规划与设计 **课程代码：** 2017201802ENVI630021.01

开课院系：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考试形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他**

姓名： 范露阳 **学号：** **17210740040** **专业：** 环境管理（17 级硕士班）

声明：我已知悉学校对于考试纪律的严肃规定，将秉持诚实守信宗旨，严守考试纪律，不作弊，不剽窃；若有违反学校考试纪律的行为，自愿接受学校严肃处理。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题号	1	2	3	4	5	6	7	8	总分
得分									

（以下为试卷正文**或课程论文题目**）

任选以下一个选题（或其他课程相关选题），写一篇论文，字数 2000 以上，具体论文题目学生拟定。

选题 1：中外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特征与发展比较；

选题 2：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选题 3：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以 XX 为例；

选题 4：绿地规划与海绵城市。

拉维莱特公园：城市绿地规划的未来先声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2017 级硕士班 17210740040 范露阳

摘 要 简述了拉维莱特公园设计案这一在规划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详细解读了最终胜出的伯纳德·屈米方案和同样广受赞誉的雷姆·库哈斯方案，从两人研究城市运行机制、探讨城市发展方向的理论成果中探究方案反映的理念和两人共通的划时代性，总结了设计案的历史意义和带给未来城市绿地规划的启示。

关键词 拉维莱特公园 城市规划 伯纳德·屈米 雷姆·库哈斯 解构主义 新城市主义

1 项目背景

1.1 城市规划的未知出路

当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竞赛被提上议事日程时，西方的城市规划正处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十字路口。现代主义的狂潮渐渐平息，柯布的光辉之城已然黯淡。在它脱胎萌芽的法国，对历史和文化调性的追念从浪漫似水的情怀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封死了大规模城市更新的一切企图，把蒙帕纳斯大楼的冒险行动钉上耻辱柱，将中心城区 300 万人 Voisin 规划的蓝图[2]驱赶到拉德芳斯的角落；美国则相反，一切存在于现代主义理想中的大尺度街区、高楼、交通干线和公园绿地，真的在资本和科技的狂嚣之下被接二连三地建造起来——然后在资本和科技更加热烈的狂嚣之下暴涨成不受控制的高密度，将光辉之城中承载生活情调的一切间隙拥塞到水泄不通，形成无文脉无肌理无尺度的无尽城市，如同一部揭露乌托邦实为废托邦的讽喻小说。在阿尔多·罗西 “场所”“类型”“纪念碑”的柏拉图式追忆中，在简·雅各布斯深挖大都市“死与生”的社会批判中，从整个建筑界、规划界既试图维系现代主义正统又小心翼翼引入邻里单元和社区自治以修补弊病的进退维谷之中，城市正在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寻找出路。呼唤变革的时代为拉维莱特公园设计案孕育了探索城市未来的契机。

1.2 公园场地及项目概况

1982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启动拉维莱特公园计划。这个原在德斯坦执政时期就有意推行的计划由此成为纪念大革命两百周年的一系列“总统工程”之一[2]，其意义将与巴士底歌剧院、拉德芳斯新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等量齐观。要在巴黎东北角建立一座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广泛多元文化特征、形式上“无法归类”的、属于未来的新型城市公园——这是法国政府的宏伟愿景，无法想象愿景以何种姿态完成，需要规划师和设

计师代他们想象愿景以何种姿态完成。一场面向全世界的竞标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幻想过能以一座公园解决城市问题，但拉维莱特注定比大多数景观设计项目更无法回避城市问题的紧迫性。紧迫性来自公园基地的历史因素——1867 年此地兴建了牲畜屠宰场及批发市场，一度有逾 3 000 名工人在此工作，其周围形成了人口稠密、混乱无序的聚居地，且居民多为外来移民；基地在交通上以环城公路和两条地铁线与巴黎主城区相联系，还有两条 19 世纪初挖掘的运河——东西向的乌尔克运河（Canal del'Ourcq）担负着为巴黎提供水源的责任，南北向的 Canal de St.Denis 则长期被用作水运航道[3]。在复杂的人群和交通条件下，想遵循法国古典的造园传统、铲除混杂多变的生产和社交活动、开辟一块隔离都市纷扰的隐逸避世之地，已经显得相当不合时宜；将公园视为城市的有机延伸、将人的活动视为设计的关键要素、创造能为周边注入活力的公共场域，才符合此项设计任务的主旨真意。

拉维莱特公园收到了来自全世界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1 个参赛方案，初选得出 9 个方案进入二轮后的正式评选[4]。竞标成为激进跨界者的胜利：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的方案夺取头名并付诸实施，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方案以细微差距位列第二但同样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两位建筑师都并不具备丰富的景观设计经验，却将个人对城市运行机理的独到理解贯彻到方案中，打破了传统造园手法的陈规，为城市绿地的规划与设计带来了革命性的范式转移。

2 屈米方案：手段与理念

2.1 由点线面生成的公园

拥有瑞士和法国双重国籍的伯纳德·屈米，是 80 年代末因 MoMA 大展而被赋予“解构主义”标签并名噪一时的一众建筑师（彼得·埃森曼、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弗兰克·盖里、丹尼尔·里伯斯金、扎哈·哈迪德等人）中少数乐于公开宣称自己的确是解构主义哲学拥趸的。他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案中与雅克·德里达结下的私交始终为人津津乐道，也使他的设计理念和手法笼上了玄妙的外衣。

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方案颠覆了公众对风景园林设计的一贯认知。如何组织轴线、如何呼应周边、如何融入地形、如何创造视野、如何形成等级秩序、甚至如何排布包括花坛草地喷泉雕塑在内的一切具体景物——所有这些老生常谈的、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似乎永不过时的基础问题在屈米的分析图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分离的点线面三层系统（图 1），悬浮在园址之上，又向四面八方的城市中无限扩展，最终依靠三层系统的叠置碰撞出一系列覆盖、连续或断开的空间关系，以几乎自发的、如同随机事件的偶然性生成各种可供自由定

义的场域。

在屈米方案的点线面三层系统中，线性体系构成了全园的交通骨架（图 2）。它由两条长廊、几条笔直的种有悬铃木的林荫道、中央跨越乌尔克运河的环形园路和一条被称为“电影式散步道”的流线型园路组成。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长廊将公园的主入口和园内的大型建筑物联系起来，同时强调了运河景观；长达 2km 的流线型园路蜿蜒于园中，与长廊的波浪形顶棚一同削弱了直线干道导致空间流于僵硬的现代主义弊病，且将 10 个象征电影片断的主题花园串联起来，表达了屈米将空间视为一系列事件的独特考虑。被“电影式散步道”串联起来的 10 个主题花园（镜园、风园、水园、葡萄园、竹园、音响圆厅、恐怖童话园、少年园、独木桥、龙园）[4]，则相应地构成了屈米方案面状体系的主体；它们风格各异、彼此独立，内容互不重复，为市民的游园体验打造了跌宕起伏、别有洞天的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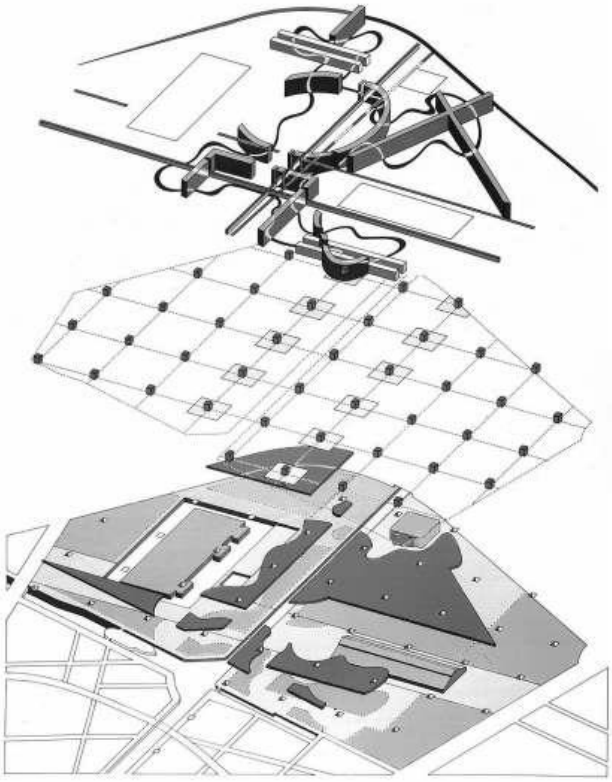

图 1　点线面系统构成的屈米方案

与线面两层系统相比，屈米方案中组成点状体系的红色 follies 已经成为拉维莱特公园最跳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符号（图 3-5）。所谓 follies，国内有“游乐亭”“钢铁怪物”“疯狂物”“无稽建筑”等花样百出的翻译，原指欧洲的古典主义园林中经常出现的、大都不具具体功能的小型构筑物；在屈米之前，follies 只是局部装饰，从未有人尝试过将大量的 follies 均匀地排满基地、用作构成空间秩序的主体结构。但屈米所赋予的秩序绝非古典园林和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所表现的清晰、谨严的秩序；边长 120 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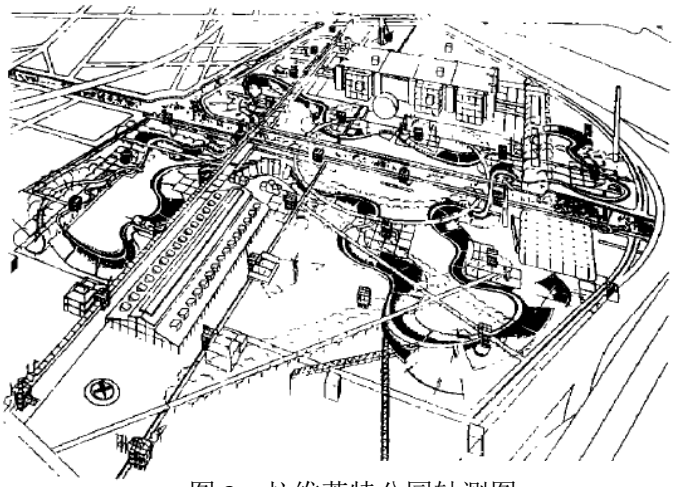

图 2　拉维莱特公园轴测图

等距网格上，所有格点的位置全部等价，所有格点上的 follies 单体尺度均为 10m*10m*10m 立方体状，没有主次等级；follies 的具体形态产生自立方体的各种错动、扭曲、裂解，手段随机、造型各异；follies 的功能完全无法由形态定义，因而获得了无规律可循的自由定义——有的处理成供游人登高望远的观景台，有些与其他服务性设施恰好落在一起而起到强调其立面或入口的作用，有些则至今是无具体功能的、雕塑般的配景。这些奇形怪状的红色格点与周围的树木、草坪和水景形成强烈对比，给全园带来了明快的节奏和韵律，赋予了游人无法预期的惊喜。

图 3-5　拉维莱特公园中的红色 follies

2.2 解构主义与《曼哈顿手稿》

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基于相对独立的、纯粹的基本元素，在随机的叠置中迫使基本元素相互干扰，生成“汇合点”、“定位点”，制造出各种偶然的、不连续的、不协调的巧合。与其说屈米的格网是准备在格网的基底上复现柯布西耶 Voisin 规划的蓝图，不如说它反而是要把机器似的 Voisin 规划像原子一样充分解离，解离到不成形的状态。可以无限延伸、无限叠置的点线面系统，在形式上没有自律性，因而为未来一切可能的加建、改建留足了余地；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是一个永不完成且以未完成性为傲的作品。这便是屈米的解构主义，这便是他从德里达的著作中得到的鼓励；一旦“能指”与“所指”的语系能够被消灭、结构的中心性和系统的稳定性被否定[5]，对建筑、规划、景观领域一切基本范畴的解体和再定义都将带来自由生长的无尽动力。

但是，虽然理解了解构主义在屈米设计手法中的反映，作为手段的解构主义本身仍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屈米何以在解构主义与他所构想的城市未来之间建立联系，或曰，屈米何

以确信他要反映在作品中的理想城市形态能够适用解构主义。这也是仅从解构主义入手理解屈米方案的关键困难所在；要解决这一困难，更重要的不是考察屈米借用的解构主义内涵，而是屈米早已形成的、认定其能与解构主义兼容的城市观念。

屈米的城市观念集中反映在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曼哈顿手稿》（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中。《手稿》将城市的现实拆解为空间/ 主体、运动和事件三个分离层面，分别赋予一系列连续的插图加以表现。空间/ 主体以平面和照片的抽象画来展现；运动以符号化图示展现；事件以报纸照片的片段来展现。放置插图的结构与插图的特定内容有关，这同城市结构与城市中的事件、运动之间的关系类似。屈米以这样的考察方法依次研究了四类城市现实，即构成《手稿》组材框架的四章——“公园”、“街道”、“塔”和“街区”[1]；在这四类不同的现实中，空间、运动、事件不断地相互交叉、叠加或突破画框，于是，在三层系统边界的随机碰撞和融合下，城市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生长出场所和建筑。这套由分裂（disjunction）到叠印（superimposition）再到建立电影式程序（cinegram）的手法[6]，高度浓缩地揭示了屈米的道路，关乎何以在城市中寻找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关乎何以在设计中构建真正激动人心之处。依靠画框的形式结构和框架内的建筑转译，空间的传统序列被颠覆，新的戏剧性的空间结构得到建立。从《曼哈顿手稿》的图像中，我们看到了拉维莱特公园的雏形。

综观屈米包括拉维莱特公园在内的全部设计实践，可以将他最核心的设计策略概括为“事件-空间”（event-space）[7]。在屈米看来，城市是空间、运动和事件的混合，且三者之间没有等级高低之分；功能主义的清规戒律已经无以为继，存在于假想中的、绝对符合理性的“正确的”世界更是必须被摒除的幻影；无需在预期的形式和预期的使用之间建立联系，丰富、多样的（且时常是偶然的）事件本身足以为城市带来最宝贵的活力。建筑师应当着力为事件创造发生的舞台，应当通过自身对都市机制的理解来尝试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和都市结构；建筑师的角色应当是批评家和革命者，尤其应当成为革命者，绝不应当成为保守者[6]。

3 库哈斯方案，及其与屈米的对照

3.1 库哈斯的城市宣言

与屈米一同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中崭露头角的，还有荷兰著名建筑师、OMA 创始人雷姆·库哈斯。出版于 1978 年的《癫狂纽约》（Delirious New York）是他最负盛名的城市研究著作，也是他日后一系列理论（以“S,M,L,XL”为代表）和作品（包括拉维莱特公园提案）的思想滥觞。

在库哈斯来到纽约之前，他曾在伦敦 AA （建筑联盟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求学、工作。受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和奥斯瓦尔德·昂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等人影响下，库哈斯热衷于解析都市形式，认识到在任何建筑的介入中都市是必要的参照，更察觉到现代文化的重要性。受彼得·埃森曼邀请，库哈斯前往埃森曼创立的纽约 IAUS（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建筑与都市研究院）工作数年，中途将其在纽约的见闻和思考写成《癫狂纽约》一书[8]。库哈斯在序言中自称是曼哈顿的枪手作家（ghostwriter），要为纽约写一篇回溯宣言，以改变纽约空有无数证据却无宣言的现状。库哈斯指出：正如埃森曼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建筑和城市的现代化从未达到全然的境界；纽约表达了真实的现代，但现代建筑本身却从未能忠诚地体现当代文化；当制式的建筑规范都不再有用时，当人们唯一追求的就是塑造现代化世界的力量时——纯粹受经济发展之需要所建，同时又受制于资本的放纵，真正进步的形式出现了，而纽约正因这种进步的力量而成为现代都市的最佳表征。

纽约是大众文化的胜地。库哈斯声称，在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情境时，大众往往比建筑师或知识分子更为敏感且表现得更为自由；若要寻找建筑所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就必须探讨大众文化；建筑师的任务不是耽溺于模型和材料的操作，也不是创造充满参照指涉的含蓄建筑，重要的是找到大众文化影响和重塑都市/建筑的途径。

癫狂纽约并不是文丘里“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翻版。文丘里的大众论是一种符号图像，愉悦地享受其中，颂扬美国商业区所有相关的丰富事物；库哈斯所追求的却是从大众文化中汲取赖以活化城市的动力——藉由利润的追求而非形式的主导介入，大众文化可以创造出不论看起来多么没有特色却合乎逻辑且赋有自身存在理由的公共领域。库哈斯从一开始就清楚的意识到他一切作品的范型就是在不受抑制的发展下塑造出来的自发性都市（spontaneous city），这与大多数长期致力于探究理想范型或根本无心探究范型的建筑师、规划师存在本质的不同。

《癫狂纽约》是一本极具库哈斯个人特色的作品，比起学术著作更像报告文学或纪实小说；这与屈米在《曼哈顿手稿》中以爱情谋杀案为引子的写法不谋而合。库哈斯在《癫狂纽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表述，包括“脑白质切除术”（lobotomy）、“分裂”（schism）[9]、“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和“社会凝聚器”（social condenser），这些概念被视为解读库哈斯日后各种作品的钥匙。“脑白质切除术”是指超高层大楼彻底解除了外部与内部、形式与功能之间相互映照、相互依存的对应关系，外部可以纯粹专注于街区样貌、如同凝滞不动的雕塑，内部却在主题、内容、符号图像各方面处于持续流变的状态，正是这种持续流变的状态保证了大都会里神经受到过度刺激的市民能持续对抗来自倦怠感的永无止境的威

胁；“分裂”是指建筑可以在各楼层毫无形式或功能连接的断裂条件下成立，每一层都可以用作完全不同的功能，内容和活动可以在建筑和城市中任意分配，这种分配不光可以在水平方向的自由平面上进行，也可以在垂直方向的自由剖面上进行；在“脑白质切除术”和“分裂”得到自由运用的基础上，曼哈顿的超高层大楼在人口和基础建设两方面成为了理想的完美典型，它的建筑促成了一种在各个层面拥塞的状态，利用拥塞激发并支持一种特定的社会交流，总括成一种独特的“拥挤文化”[10]；依托这种“拥挤文化”，超高层大楼获得了作为一种独有类型存在的潜在可能性，成为一个被曼哈顿具体化的构成主义式的“社会凝聚器（social condenser）”，这曾是早期现代主义和苏俄构成主义一度苦苦追寻的理想，但最终实现理想的并不是他们所描绘的乌托邦，而是纽约的超高层大楼。

3.2 库哈斯方案：水平条带的无限叠加

库哈斯提交的拉维莱特公园提案，与《癫狂纽约》中的思想存在着刻意的联系。项目以“脑白质切除术”的果决手段将摩天大楼的建筑形式抽离，保留其内部生成空间的功能逻辑，将垂直生长的高密度都市投射到绿地表面，如同横放的布朗库西“无尽之柱”，成为曼哈顿“拥挤文化”的无建筑、非实体化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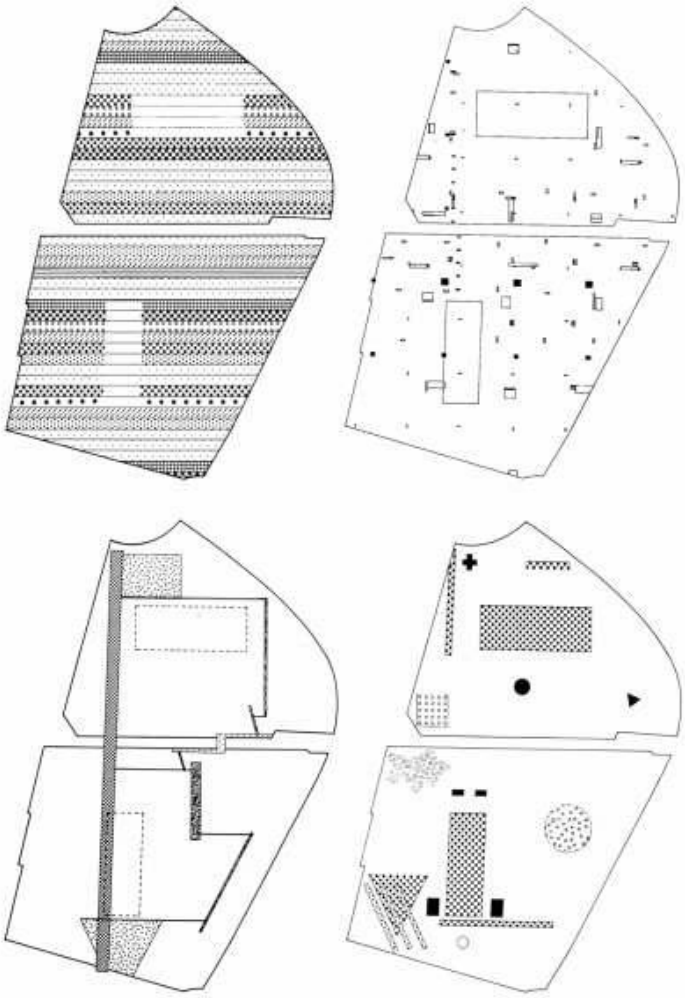

图 6 水平条带系统构成的库哈斯方案

库哈斯方案包括两部分：首先将场地解析为大量东西走向、匀质等宽（50m）的水平条带，作为城市结构的一个特定层面；然后将水平条带自由组材，生成 4 个叠加层，即“五彩纸屑”（confetti）、通路、主要元素、联系和节点[1]（图 6）。

对未曾接触过库哈斯城市理论的路人而言，公园方案最显眼、最激进也最难以理解的做法正是其将场地分为 50m 宽水平条带的

起始操作。显然 50m 宽的水平条带是库哈斯构想的土地基本单位，将这些单位组合即可将公园的多种土地利用内容进行分区，但问题在于为何基本单位的形式是水平条带而非其他。事实上，水平条带的拆分和条带自身的设计正是《癫狂纽约》中“脑白质切除术”和“分裂”的反映。“分裂”是指每个条带容纳不同的功能，并为特定功能而设计；这如同曼哈顿的摩天楼，解决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冲突。条带之间先天不存在任何关联，使在配置拉维莱特公园的复杂内容时，既可以彼此隔绝，又可以随意组合，进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脑白质切除术”则体现在与条带平行的植物带和植物带内树种“根据辨证和美学需要”的依次排列；这些植物带如同曼哈顿的摩天楼，外部只需关注形式，内部只需关注功能。在 1985 年的一次访谈中，库哈斯就将这些条带类比为曼哈顿摩天楼的各个楼层（称其为“水平的摩天楼”）[1]。分区条带作为城市结构的必要层面，满足了对大都会领地进行分隔、控制的要求。

在库哈斯的拉维莱特公园方案中，曼哈顿的“拥挤文化”主要依靠条带的排列组合以及条带自身的设计来体现。其他层面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与条带内容一起，共同促成了“拥挤”的感觉：地段中点状分布的小型元素构成的“五彩纸屑层”有意地加强了景观的破碎化；通路和联系层维持了公园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联通，将公园空间引向活跃的巴黎城区；主要元素层（现存的主要建筑物）配上主要景观建造，为游人创造了丰富的活动场所。

库哈斯的拉维莱特方案清晰地建立了一个衍生自城市、尤其是纽约市的媒介结构。它超越了抽象的土地规划和固有的园林景观范式，直接与复杂繁多的城市生活相联系，重申了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流变状态，将公园打造成容纳生产生活多样化日常进程的社会凝聚器。体现在拉维莱特公园“无形拥挤的文化”中的公式（条带、“脑白质切除术”、“分裂”），作为形式、内容和城市中断续现实的媒介，高度吻合了库哈斯对城市在生产力助推下自发性生长趋向的探讨，体现了主办方“21 世纪新型城市公园”的宏伟目标。

3.3 库哈斯和屈米：不约而同

对比库哈斯方案与屈米方案，可以发现两人从理念到手法上存在的大量共通之处。首先，在根本观念层面，两人都在绿地规划与设计这一在传统视野下有别于建筑和城市的领域高度贯彻了自身对建筑和城市的理解，使公园成为理想城市的自然延伸，仅此一点就与多数仍在传统园林设计手法之内小修小补的参赛者构成了天壤之别；其次，不论是否明确支持解构主义，两人都在解读城市和设计城市时首先将具体功能（通行、游乐、社交等等）和具体形态（广场、绿化、走廊、水系等等）从有待操作的样本中彻底剥离出去，将场地拆解为抽象元素构成的基本单元（点线面、水平条带）；再次，两人都依靠基本单元的组合、叠置、碰撞和交错生成各类场所和功能，且这些组合、叠置、碰撞和交错的生成过程都充满偶然性、随

机性、不可预见性，体现了城市自发生长、永恒变化的更新动力；最重要的是，两人都在从研究到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对市民群体的行为和行为构成的事件投注了高度的关怀，将其视作与空间、物件同等重要甚至比空间、物件更具基础意义的素材。屈米方案在 follies 格网、电影式步道和 10 座叙事花园的营造中高度遵照了“事件-空间”的信条；库哈斯方案似乎更抽象，但他对纽约生产生活复杂过程的理解在依据“脑白质切除术”、“分裂”理念的条带切分和展现“拥挤文化”的密集排列中就已深入骨血。可以说，库哈斯和屈米两人的方案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城市的真正本质——构成其生命的从来不是单纯的物质环境，而是聚集并栖居于其中的人。

4 历史意义和未来启示

4.1 划时代的成就

拉维莱特公园是屈米和库哈斯的胜利，更是城市的胜利。两人的方案对景观设计领域主流观点和做法的超越是全面的。这种超越表现在：

（1）超越古典主义传统，以均等、并列、开放、无限延展、不确定的新型空间秩序取代严整、对称、中心化、等级分明的旧有秩序，寻找到有别于轴线构成、植物要素排布和几何形修饰的全新景观语系，让凡尔赛的勒·诺特尔[11]和拿破仑三世时代的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真正完成使命，让历史的光荣回归历史；

（2）超越自然主义传统，不再一味模仿自然，不再流连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不再编织远离人造世界、隐逸乡野的浪漫幻景，为绿地规划和设计赋予了比处理草坪、树木、花卉和水系更高层次的核心议题，使城市公园真正参与到高密度、高频率的都市生产生活过程中去，让人们看到城市化可以实现的良好面貌，即通过改善公共环境来提高都市活力；

（3）超越现代主义陷阱，以事件和空间并置的包容度摆脱了功能主导形式、以功能主义代替现代精神的误区，将规划设计摆到为事件搭建舞台、培育自发性和偶然交汇的角色上，从诉诸绝对理性的柯布西耶光明城式蓝图中滤去自上而下建立绝对控制的机械唯物论和极权主义基因，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和市民阶层对集体生活空间的保护之间建立富有弹性的中间地带，实现整体有序、单体自由的双赢格局；

（4）超越当时规划界普遍流行的细分街区、引入弯曲小道、保存公共场所、构建邻里单元等各种对现代主义的不彻底改进方案，超越以里昂·克里尔（Leon Krier）为代表的抵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保守心态[12]，在保留巨尺度的前提下容纳高密度，适应了经济增长和资本推动下城市主动集聚、向上生长的趋势，搭建了从现代主义通往新城市主义、景观城市

主义[13]的桥梁；

（5）超越阿尔多·罗西、彼得·埃森曼、奥斯瓦尔德·昂格斯等人早期作出的将城市科学化、哲学化、系统化的探索，摆脱了结构主义和公理化倾向带来的不必要的困难，更从一众追随者营造的对文脉、历史和城市“类型学”柏拉图式回溯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直面高强度开发下文脉和历史消解的城市现实，拥抱消费社会高速代谢的不确定性，不试图抗拒时代，却获得了既适应时代浪潮又能构建美好愿景的潜力。

4.2 城市绿地规划的未来展望

拉维莱特公园设计案的结果，为面向未来的规划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这种启示有关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城市功能、怎样把握城市的系统性特征、怎样适应人口的高密度和活动的高频率、怎样创造具有磁力效应的能激活公共空间的特殊场域。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筑、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的界线正在模糊。城市是一个日益庞大的复杂巨系统，任何身处其中的场所都必须依靠与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才能存续，没有任何要素能独立于系统之外。在可见的未来，伴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城市中心区土地紧缺的现实，建筑、空间、景观一体化的垂直生长的超巨型城市综合体将使尺度概念和小尺度下的城市问题逐一失效。

（2）规划者必须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城市远大于城市的物理环境，远大于城市中所有道路、建筑和场地的机械求和。维系城市生命的是事件，是活动，是资源的集聚和共享，是人流的交汇和人流交汇导致的高频次社交。拥挤的公共场所比空旷僻静的空地更接近城市未来永续发展的面貌，疏解拥挤的城市中心地带也远比重振衰落的空城更具可行性。公园、绿地、城市中的一切开阔地，都应追求吸纳社会、盘活社会而非回避社会。

（3）没有单一场所相称于单一功能。城市在局部可以是断裂的、拼盘式的，但整体一定是混合、多样的。不要奢望功能布局的绝对理性，不要在先进交通工具所能达到的速度上限中寻找短时间实现人群大批量转运的福音。步行范围内的可达性、休闲和服务设施的接近性永远是公共空间下的宝贵资源，设计者要敢于为多种场所的关联、交叉甚至冲突留下地盘。

（4）城市处在永恒的流变中。资本和技术的自发力量时刻主导着城市改变形态。以人为手段划定边界、构想并追求如同历史终结的完美图景，结果都将是徒劳，且可能有害。作为设计结果的媒介结构，要服务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当代城市中的运动、事件和内容，必须适应当前快速转变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而且还必须接受、适应甚至促成这种变化、分裂和叠加的状态。无论媒介结构是二维还是三维，它的主要任务是形成具有弹性和适应性的框架，

以容纳城市通往未来的永恒流变。

参考文献

[1] 达根哈特, 孙凌波. 可持续的城市形式与结构论题：屈米和库哈斯在拉维莱特公园[J]. 世界建筑, 2010, (1): 85-89.
[2] 张倩. 新型城市公园探索理想的解构实践——多样化的拉维莱特公园[J]. 四川建筑, 2015, 35(6): 99-103.
[3] 白鑫. 伯纳德·屈米拉维莱特公园理论分析[J]. 山西建筑, 2007, 33(4): 39-40.
[4] 朱建宁. 拉·维莱特公园：城市公园的未来？[J]. 广西城镇建设, 2013, (1): 22-29.
[5] 黄正荣. 解构主义建筑的哲学述评——兼论建筑的本原[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 14(2): 92-97.
[6] 楚超超. 关于屈米[J]. 建筑与文化, 2008, (8): 74-77.
[7] 王昳. 《曼哈顿手稿》的联想[J]. 建筑与文化, 2010, (1): 110-111.
[8] 朱亦民. 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的库哈斯(1)[J]. 世界建筑, 2005, (7): 33-39.
[9] 张昊, 张弛, 郦伟, 等. 库哈斯建筑思想评述[J]. 惠州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24(3): 102-107.
[10] 钟念来. 《癫狂的纽约》的意义[J]. 时代建筑, 2011, (5): 168-169.
[11] 朱雷. 从凡尔赛到拉·维莱特——试析两个圈的空向构成与巴黎城市的双重脉络[J]. 境外建筑, 2007, (1): 97-100.
[12] 张云徽. 拉维莱特公园的城市质感[J]. 书城, 2012, (5): 90-97.
[13] 华晓宁, 吴琅. 回眸拉·维莱特公园——景观都市主义的滥觞[J]. 中国园林, 2009, (10): 69-72.